



第七十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2(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过渡期正义进程中的性别视角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
法比安·萨尔维奥利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6/7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4/150。



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审议了在国家过渡司法战略和机制(包括寻求真相、问责、赔偿、保证不再发生和纪念进程)的构思、设计和实施中采用性别平等视角这一做法的多个方面,以便对遭受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妇女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做出充分和全面的回应,并确保他们有效参与这些进程。

目录

	页次
导言	4
一. 一般考虑	4
二. 真相委员会	4
三. 赔偿	9
四. 刑事起诉	13
五. 保证不再发生	15
六. 纪念	17
七. 参与过渡期正义进程	18
八. 结论和建议	20

导言

1. 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法比安·萨尔维奥利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6/7 号决议向理事会提交本报告。在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分析了在过渡期正义进程中采用性别平等视角这一做法的多个方面。在编写报告时，与国家、民间社会、受害人、专家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举行了公开协商。特别报告员对收到的回应表示感谢。

一. 一般考虑

2. 特别报告员认为，要使过渡期正义进程取得成功并符合人权标准，需要对其五个支柱开展全面工作：真相、正义、赔偿、保证不再发生、纪念。自其第 1325(2000) 号标志性决议和其后第 1820(2008)、第 1888(2009)、第 1889(2009) 和第 1960(2010) 号决议以来，安全理事会特别关注女性、和平和安全问题。安全理事会在这些决议中呼吁增加各级决策层的女性人数，并为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建立敏感对待性别问题的机制，包括在司法和安全部门改革进程中采取此种行动。

3. 特别报告员的职责包括在履行其任务的过程中采纳性别平等视角和以受害人为中心的办法。¹ 他的专题报告和访问报告均遵循这一办法。

4. 本报告就特别报告员任务的不同领域论述了性别平等视角的多个方面，因为在应对和预防基于性别的侵犯行为时，需要适当考虑到遭受性别暴力这种经历的复杂性和交叉性，其中不仅包括女性的经历，也包括遭受性别暴力的男性的经历，还包括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经历。²

5. 父权制和基于性别方面陈规定型观念的角色分配助长了对妇女的系统性和结构性歧视，影响到生活的所有领域，并影响到所有妇女，特别是农村地区生活贫困的妇女、少数民族妇女、残疾妇女、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等。³

二. 真相委员会

6. 为解决大规模和/或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问题，真相调查进程越来越关注受害人。秘书长回顾，真相委员会是增加受害人受关注度、促进其参与的工具，并且将重点置于历史上受到歧视的个人、社区或民众，包括女性在内。⁴ 然而，直到最近，女性仍是所有受害人中被遗忘的部分，各真相委员会也忽视或仅仅表面上涉及性别问题。男性遭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问题

¹ A/HRC/RES/18/7。

² 本报告未提及间性者的情况。有关内容见 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iscrimination/LGBT/BackgroundNoteHumanRightsViolationsagainstIntersexPeople.pdf。

³ 见 A/HRC/29/40/Add.2 和 A/HRC/41/33/Add.1。

⁴ 见 A/67/368，第 32 段。

也显然被遗忘和忽视，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而言尤其如此。此外，绝大多数真相调查进程普遍缺乏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关注。

A. 任务

7. 早期的真相委员会无视性别差异，并忽视基于性别、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严重侵权行为。随着时间推移，真相委员会的设计和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随着国际社会在公共议程中日益关注将性别问题主流化、制度化，真相委员会与之保持了同步。

8. 例如，阿根廷的全国人口失踪委员会(1983年)和智利的全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1990年)的任务中均未明确提及性暴力或性别暴力。尽管危地马拉(1994年)、南非(1995年)和秘鲁(2000年)的真相委员会也未在任务中明确提及性别暴力，但它们使这一问题受到了更多关注。这已经成为发展趋势，⁵ 并且其后成立的各委员会，例如塞拉利昂(2000年)、东帝汶(2001)或利比里亚(2005年)的真相委员会，已经在其任务描述中以一些形式提及了性别平等视角(冈比亚)或明确表明了性别平等视角(哥伦比亚)。

9. 任务的中立性必然导致偏向于男性的经历，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在任务规定中要求关注性别问题加以解决。此举十分重要，因为这使委员会承担法律义务(并给受害人提供一个执法途径)，促使委员会在设计、预算、组织和行动诸方面采取综合办法应对性别平等问题。

10. 任务的描述应当全面述及性别的影响，包括所有人遭受的性暴力和其他性别暴力，⁶ 同时应当顾及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这个层面。在所有情况下均必须采用交叉视角，指出在非二元的性别观下如何使用某些社会差异标志。⁷ 哥伦比亚真相委员会在任务中明确规定，在查明冲突的影响时应关注的类别包括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

B. 组织结构

11. 加纳民族和解委员会和摩洛哥公正与和解委员会采用跨领域战略，将性别平等用作一项组织原则，但没有建立专门机构处理相应问题。这一办法有可能削弱关注重点。

12. 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和厄瓜多尔真相委员会在组织结构中建立了专门针对性别问题的特别单位。这样做就有一个业务单位专门关注基于性别的侵犯人权行为方式，但可能导致其他工作单位忽视这一问题。

13. 实践表明，为确保委员会在所有阶段工作中均可实施跨领域的、系统的办法，需要采取有机的综合战略，包括专门的性别平等问题股(包括具有不同性取向和

⁵ 见 [A/HRC/14/22](#)，第 26 段。

⁶ 见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 “When No One Calls it Rape: Addressing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Men and Boys in Transitional Contexts”, New York, ICTJ, December 2016.

⁷ 来自国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协会(ILGA)及全球女性联合会的回应。

性别认同的性别平等分析领域咨询人和专家),并在其他工作小组中融入专业成员。东帝汶真相、接纳与和解委员会和哥伦比亚真相委员会主要实施了这一战略,将跨领域的顾及性别平等的方式纳入其所有工作中,并创建了性别平等工作组,与女性组织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组织开展技术和协调工作。⁸

C. 业务问题

1. 工作人员培训及其履历和资质

14. 必须实现委员会成员的性别均等或均衡。这样做能够:(a)使委员会在工作中更加重视关于采纳性别平等视角的政治决定,(b)确保委员会最高决策层有女性成员;(c)拉近委员会与女性受害人的距离。所有委员会工作人员应对性别平等问题有足够的认识⁹并且持续接受培训,以对性别平等、性暴力(包括对男性、男童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性暴力)、克服偏见等事项增强意识。培训可由同一个性别平等问题股在内部举办(如在加纳和秘鲁),或在外部的国家或国际机构支持下举办(如哥伦比亚与国家组织举办,马里与国际组织或国际合作组织举办,塞拉利昂和摩洛哥与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联合国妇女署)举办)。

15. 这一培训进程对收集陈述的小组尤为必要,因为他们是第一个(有时也是唯一的)与受害人的联络人。在秘鲁,委员会在性别平等问题股的参与下制定了访谈手册,同时在委员会大区总部召开了关于性别平等的培训讲习班。¹⁰哥伦比亚真相委员会编写了应对性暴力的指南,以避免受害人再次受害。¹¹访谈者应受过有关访谈技巧的培训,可以安全、保密、敏感地确定并记录男女受害人、性暴力幸存者或是由于实际或认定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而遭受暴力的人的经历。¹²同时,鉴于访谈的治疗价值,访谈者也应受过培训以应对不愿接受访谈的情况。

2. 侵权行为研究的范围

16. 同时适用不可克减的核心人权、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人权法、人道法、国际刑法及其各自的判例法,就能够在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清单中列入诸如酷刑以及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性暴力、暴力侵害儿童等侵权行为,同时也能够对这些侵权行为采用更广泛的定义,涵盖诸如强迫裸体、不当接触、残割和击打生殖器、强迫卖淫、性奴役、强奸、强迫堕胎、有意或无意地由强奸导致的强迫怀孕、强迫受孕、强迫绝育、强迫乱伦、恶意或无意地通过强奸传播性病、以酷刑或性暴力有意或无意地致人失去生殖能力、囚禁劳动、盗婴等其他侵犯行

⁸ 来自生殖权利中心和全球女性联合会的回应。

⁹ 来自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回应。

¹⁰ Julissa Mantilla Falcón, “La Comisión de la Verdad y Reconciliación en el Perú y la perspectiva de género: principales logros y hallazgo”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in Peru and the gender perspective: main achievements and findings), *Revista del Instituto Interamericano de Derechos Humanos (Inter-American Institution of Human Rights Journal)*, vol.43, 2006, pp.355 and 356.

¹¹ 来自生殖权利中心的回应。

¹² 来自所有曾受害者项目基金会的回应。

为。根据个人的描述适当地解读所调查侵犯行为的范围对于真相委员会各小组联合开展工作至关重要。

17. 必须避免将女性的遭遇都归为性暴力侵害，把女性降格到只具有性的属性。秘鲁、塞拉利昂、东帝汶的经验显示，只有涵盖了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各种不同影响及其对女性的间接影响，考虑到人口、族裔、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才能反映她们的遭遇。这些遭遇包括由于遭受了强奸、酷刑或残割等侵害，或由于失去伴侣及因此而缺乏法律保障、失去社会地位和生计，在婚内、家庭中和/或社区中受到多种形式的污名化、边缘化或排斥。

18. 陈述记录的格式及数据库的设计应能记录直接和间接侵犯行为，并应能记录对直接和间接受害人的影响，而且叙事方式和建议应适当涵盖对不同性别人员的影响。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方法是在决定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调查工作主流之前就设计的，因此达不到所求的深度，在贯穿各领域方面也有欠缺。¹³ 厄瓜多尔真相委员会表示，一些形式的性暴力在数量和性质上被少报的原因是在采用性暴力这一分类之前已经开始收集证词。¹⁴

3. 公开听证会

19. 一些委员会为了在其程序中给性别差异以应有的重视，专门为女性举行听证会¹⁵ (例如巴西的圣保罗真相委员会和国家真相委员会，以及在冈比亚、马里、摩洛哥、秘鲁、塞拉利昂、东帝汶)。其他一些委员会还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情况举行听证会，例如圣保罗真相委员会曾举办“独裁与同性恋：来自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运动的反抗”公开听证会。¹⁶

20. 受害人在听证会中再次受害的风险高，设计听证会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证人的知情同意必不可少。在听证会之前、期间和之后必须确保提供社会心理支持。证人必须处在体面和安全的环境中，在准备证词和预测法庭讯问的问题方面获得帮助，而且在受害人回到社区后须采取保护和安全措施，防止社会暴露，避免对其造成进一步伤害。

4. 传播、宣传和伙伴关系

21. 就女性受害人而言，会出现她们是否认为自己是受害人的问题，不论其所受的是一般的侵犯人权行为，还是具体到性暴力行为。许多女性不将危害她们的犯罪行为视作侵犯其人权的行为，她们还可能优先讲述别人的经历，从而淡化自己

¹³ Julie Guillerot, “La verdad de las mujeres debe ser escuchada. Retos y logros al incorporar una perspectiva de género en la Comisión de la Verdad y Reconciliación del Perú” (Women’s truth must be heard. Challenges and achievements in incorporating a gender perspective in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Peru), *Enfoque de género en Comisiones de la Verdad. Experiencias en América Latina y África (Gender Focus in Truth Commissions. Experiences in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Hego Institute, 2020, unpublished.

¹⁴ 来自厄瓜多尔的回答。

¹⁵ 见 [A/HRC/14/22](#)，第 26 段。

¹⁶ 来自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过渡期正义研究中心的回答。

所遭受的侵害行为，使其遭遇不为人知。¹⁷ 具体就性暴力而言，受害人大多保持沉默，不仅因为感到内疚、羞耻或害怕被社区污名化或排斥，也因为受害人深信由于缺乏制度保护，任何控诉都是徒劳无益的，这也凸显了性别歧视文化模式的影响程度。如果性暴力受害人为男性、男童、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尤其是如果他们遭到攻击的原因是实际或别人认为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则这些受害人比较倾向于保持沉默。

22. 鉴于上述情况以及历史记录可能被歪曲的风险，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战略来提供支持和建立信任，激励女性、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以及一般而言的性暴力受害人提供陈述。

23. 真相委员会的传播与宣传活动至关重要，编制的传播材料必须特别注意使用无性别歧视的语言和图像，要传递性别公平的信息，提倡对性别问题敏感，明确将性别暴力纳入应调查的侵权行为清单。在加纳，媒体订立了公共合同，承诺在这方面进行负责任的报道。¹⁸

24. 真相委员会与民间社会(人权组织、妇女组织、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组织、女权组织、学术界)建立并保持密切联系，可以在概念和业务层面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民间社会了解女性受害人和证人的情况，与他们有特殊关系。

5. 最后报告

25. 最后报告以前很少提及女性，现已逐渐转向重视强奸、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并对女性在冲突历史中的角色、助长虐待女性行为的条件、女性受害人的情况等问题进行更具综合性的分析。¹⁹ 在摩洛哥，公正与和解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中有一节专门阐述性别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以及严重侵犯人权行为。²⁰ 在秘鲁，最后报告中有一章阐述对女性的性暴力行为，还有一章阐述侵犯人权行为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巴西国家真相委员会的最后报告更进一步，除了有专门一章阐述性暴力、性别暴力、暴力侵害儿童及青少年的行为，还有一节阐述独裁统治和同性恋问题，以审视独裁统治下系统的、普遍的暴力如何影响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

26. 最后报告日益注重探讨侵犯人权行为是如何建立在过去的平等、等级关系、歧视、族裔不公平、社会不公平、性别不公平等情况之上的，以及侵犯人权行为及其后果是如何使这些情况恶化的。为了在最后报告中将性别问题纳入主流，

¹⁷ Julie Guillerot, "Linking Gender and Reparations in Peru: A Failed Opportunity", in Ruth Rubio-Marín (ed.), *What Happened to the Women? Gender and Reparations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2006.

¹⁸ Vasuki Nesiah and others, *Truth Commissions and Gender: Principles,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ICTJ, 2006, p. 19. 另见 [A/HRC/14/22](#)。

¹⁹ Vasuki Nesiah and others, *Truth Commission and Gender*, p. 36; and Sunneva Gilmore and others (eds.), *Beyond Silence and Stigma: Crafting a Gender-Sensitive Approach for Victims of Sexual Violence in Domestic Reparation Programmes*, 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 2020.

²⁰ 来自摩洛哥国家人权理事会的回应。

也为了确保建议充分回应暴力行为的原因及后果，必须将工作小组的发现及其反馈进行内部分发和横向传播。

三. 赔偿

27. 第一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受害人赔偿方案没有区分女性遭受的特定受害形式。这些方案也没有认真考虑有哪些重要方面可以避免在没有考虑到女性的需求、利益或愿景的情况下对个人或集体进行物质的或象征性的赔偿。²¹ 后来作出了改进，但局限于扩大可获得赔偿的侵权行为目录，以避免在制度上轻视强奸或性暴力。现在则已明确将性别视角纳入赔偿方案，目的是就性犯罪提供赔偿，并确定可能对不同性别有不同影响的赔偿判决。²² 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相关问题也应采取相似视角。

A. 有资格获得赔偿的受害人范围的定义

28. 在制定行政赔偿方案时，通过列举有资格获得赔偿的侵权行为以及确定赔偿措施针对的受害人类别，对属事管辖权及属人豁免进行限制。这些判决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包容与排斥。这些不仅是技术性的判决，因为其政治作用会影响赔偿方案的覆盖范围和可信度，进而影响过渡期正义进程的政治效力。

29. 赔偿方案不应重蹈性别歧视的旧辙。目前，赔偿方案为了从性别敏感的视角界定有资格获得赔偿的受害人这一概念和需要救济的侵权行为清单，通常采取下述办法：

(a) 使用以性别平等为重点的渐进式分类法分析不同的侵犯人权行为(具体包括性暴力以及侵犯性权利和生殖权利的行为)，同时分析被迫流离失所、侵犯经济和社会权利行为对不同性别受害人的影响；

(b) 将死者或失踪者的亲属归入受害人，将其视作受害人的继承人和直接受害人提供全额赔偿；

(c) 将曾受害人的亲属纳入该分类；将遭强奸所生儿童视作性暴力的独立受害人；将某些情况视作独立的受侵犯情况，例如某人的人生计划因寻求亲属的释放或照顾虐待致残的亲属而受阻的情况(此类情况往往是女性的遭遇)；²³

²¹ Ruth Rubio-Marin, “Mujer y reparación: apuntes para la reflexión” (Women and reparations: notes for reflection), in Julie Guillerot, *Para no olvidarlas más. Mujeres y reparaciones en el Perú* (Not to be forgotten. Women and reparations in Peru), Lima, APRODEH-DEMUS-PCS, 2007, p. 14.

²² Julie Guillerot, *Reparaciones con perspectiva de género (Gender-responsive reparations)*, Office in Mexico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Mexico Federal District, 2009, p. 64.

²³ Gilmore and others, *Beyond Silence and Stigma*, p. 38.

(d) 所采用的家庭定义不局限于死板的或纯法律的概念,²⁴也不局限于主流文化观念,而是包含与主要受害人情感相依或有依赖关系的人;

(e) 包含复合受害人,即本身是施害者的受害人,因为其本人在监禁期间或在其非国家武装团体中可能曾遭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²⁵

30. 对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也应予类似的考虑。2011 年第 1448 号法(哥伦比亚《受害者和归还土地法》)第 13 条为了实施人道主义援助、全面照顾、援助、赔偿措施,确立了采用差别化办法的原则,将有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人确定为需要特别关注和保护的受害人,规定国家必须根据受害人的具体特点做出反应。截至 2020 年 3 月,受害人登记处共确定了 481 位自 1985 年以来遭受性暴力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受害人。²⁶

B. 赔偿措施的定义

31. 为防止赔偿措施直接或间接地重蹈性别歧视的旧辙,必须理解女性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遭受伤害的复杂性及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考虑所遭受侵犯行为的污名效应,将重点放在变革性赔偿上,排除污名化赔偿。²⁷

1. 强奸的污名效应

32. 某些罪行除了造成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还对受害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间接影响。应采取步骤,避免使用基于性别歧视偏见的标准和参数确定和量化实际损害、利润损失、错失机会、人生计划受阻等因素,在确定赔偿措施时对间接影响进行适当评估。

33. 最明显的例子也许就是强奸,因为该行为除了导致直接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外,还可能造成强迫怀孕、性传播疾病、失去生育能力等后果。为了在方法上敏感对待性别问题,应考虑到这些间接侵权行为,确定额外措施进行救济。在克罗地亚,如有应加重处罚情节,可提高强奸案的赔偿数额。

34. 此外,一些罪行的间接影响范围包括受害人与自身环境的关系,还包括受害人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享受。例如,丈夫的排斥、无法结婚或继承、在家庭或社区中的污名化可能导致受害人无法获得生计并需要有效的应对措施,例如获得定期的养恤金。

²⁴ 在摩洛哥,未将伊斯兰教法有关继承的法律规则(对女性不利)适用于对所有权继承人的补偿(来自摩洛哥国家人权理事会的回应)。

²⁵ Gilmore and others, *Beyond Silence and Stigma*, p. 39。

²⁶ 来自所有曾受害者项目基金会的回应。

²⁷ 见 Julie Guillerot, *Reparaciones con perspectiva de género*(Gender-responsive reparations), pp. 105-107。

2. 赔偿的污名效应

35. 必须仔细评估何种赔偿措施最为合适，在通常以社区为先的文化和背景背景下尤其如此。个人赔偿原则上迫使受害人受到关注，可能使其容易再次受到伤害。

36. 另一方面，集体赔偿看似是防止女性污名化的最佳替代做法，²⁸ 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较少参与确定赔偿金，其有效获取赔偿的能力有限，因此集体赔偿可能造成困难。在秘鲁，集体赔偿方案调整了确定集体赔偿项目的协商程序，以确保女性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能够参与。²⁹

3. 赔偿的变革性影响

37. 女性传统上处于受排斥、不平等、受歧视的条件下，为赔偿而采取的传统救济方法对女性是不充分的。回到侵犯行为之前的情况是不够的，因为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可以切实享受其权利。赔偿应致力于改变原已存在的可能产生了女性所遭受暴力事件的结构性的不平等状况。³⁰

38. 在定义赔偿措施时，应探索可以变革性别排斥结构的措施。换言之，应探索能达到如下效果的措施：

- (a) 可以对女性的实际生活和其自尊产生变革性影响；
- (b) 促进切实缩小性别平等方面现存的差距；
- (c) 推动将女性重新定位，将其视作社区和家庭中的个体；

(d) 鼓励让女性融入其他空间，或给予其一定程度的经济或其他自主权，并使女性在危机和冲突期间取得的新地位能得到反映。

39. 真相委员会推荐了秘鲁、塞拉利昂、东帝汶等国赔偿方案所取得的进展，在这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实例(确立了恢复身份权、宣布某人因强迫失踪而不在、允许女性将新关系正常化、继承和处置财产等项权利)。此外还有一些可以产生变革性影响的社会援助计划(例如扫盲教育、获取更高层次的学校教育；身心保健服务；生产方面的培训、就业、小额信贷等机会)。

40. 所采取的解决方案如能考虑到性别问题及其交叉性质(即性别问题的族裔、文化、社会根源)，则可切实缩小性别平等方面现存的差距，提高女性在社区和家庭中的地位，并提高女性自身作为个体的地位。

²⁸ 见 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Women/WRGS/PeaceAndSecurity/ReparationsForCRSV_sp.pdf, p.10。

²⁹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High-level Multisectoral Commission, “Lineamientos para la adopción de acciones diferenciadas en la implementación del plan integral de reparaciones para las mujeres y la población LGBTBI” (Guidelines for the adoption of differentiated action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reparations plan for women and the LGBTBI population), 2018, 可查阅：https://cman.minjus.gob.pe/wp-content/uploads/2019/03/PIR_LineamientosMujeres_PoblacionLGTBI_060319.pdf。

³⁰ 见 A/HRC/14/22，第 31 段。

C. 执行

41. 为了在执行时保持对性别平等的关注，需审查性别方面的不平等和歧视情况，并需全面了解社会的性别结构、此结构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影响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妇女享受社会援助方案的能力。

1. 评定

42. 赔偿方案中的证据标准不应导致排斥情况，也不应与法院审案的做法看齐。阿根廷的制度要求过多，在实践中取得的成果非常有限。³¹ 危地马拉的国家赔偿计划不是承担“证明责任”的机构，结果使最贫困和最边缘化阶层的人(尤其是遭受过性暴力的土著妇女和女童)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³² 在另一些严重侵犯人权的实例中，一些实体就针对具体性别的相关侵权行为采用了推定办法，或者采用了较低的或不同的证据检验办法。³³ 秘鲁受害人单一登记处的实践表明其采用相对简单的流程，对受害人所述采用了真实性推定。

43. 挑战在于如何加快和促进这些方面的程序，同时规定由评定机构承担证明责任，如同摩洛哥公正与和解委员会所做的那样。³⁴

44. 另一个风险是向评定机构报告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案件少于实际情况。必须为女性创造条件让她们能举报案件，逐步设计去中心化的、公开的流程(如秘鲁、东帝汶所做的那样)，为提交申请和确定更多受害人提供便利条件，同时切实保密并创造安全的环境，防止二次伤害、污名化或报复行为。³⁵ 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往往是造成排斥情况的原因。科索沃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有权帮助受害人填写申请表和获取证据，有助于受害人在立案过程中建立信心。³⁶

45. 有一种鉴别和评定战略既能克服证据方面的障碍，又能解决如何使女性敢于发声这一挑战，那就是让她们有权要求确定某些侵权行为是否属于累犯情况，从而建立有推定规则和积极区别对待规则的适当制度(如摩洛哥所做的那样)。³⁷

³¹ Maria José Guembe, “La experiencia argentina de reparación económica de graves violaciones a los derechos humanos” (The Argentine experience of economic reparation for seriou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 in Catalina Díaz (ed.) *Reparaciones: Estudios de caso, conceptos y propuestas* (*Reparations: cases studies, concepts and proposals*), Bogotá, ICTJ, 2008, pp 19-70。

³² Claudiz Paz and Paz Bailey, “Guatemala: Gender and Reparations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 in Ruth Rubio-Marin (ed.), *What Happened to the Women? Gender and Reparations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2006, p. 110。

³³ 见 A/69/518, 第 71 段。

³⁴ 来自摩洛哥国家人权理事会的回应。

³⁵ 见 A/69/518, 第 71 段。

³⁶ Gilmore and others, *Beyond Silence and Stigma*, p. 43。

³⁷ ICTJ, Morocco: Gender and the Transitional Justice Process, ICTJ, 2001, p. 27。

2. 诉诸赔偿方案

46. 女性在有效诉诸赔偿方案方面有若干障碍，包括：文盲率较高，难以直接获取信息；贫困率较高；缺乏法律自主和经济自主；被排除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之外；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贬低女性的态度、影响女性的习俗；不信任国家机构、对国家机构的结构缺乏知识和了解；女性对提出索赔感到恐惧和顾忌，其中性暴力受害人对遭受排斥和污名化感到恐惧、羞耻、负罪。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而言，可能有法律障碍(包括至少 69 个国家仍存在将性行为或性别多样性定为刑事犯罪的现象，或者在法律上限制对性别认同的承认)，还可能有社会障碍(害怕污名化和偏见导致社会排斥)。要设计出合理、易于理解、便于受害人诉诸的执行程序，就必须考虑到这些障碍。

47. 所设计的恢复性或补偿性赔偿的执行进程应当可以审视法律制度是否给女性提供法律或事实上的能力来成为例如财产权持有人或银行账户持有人。³⁸

3. 确定优先顺序

48. 执行赔偿方案时应做到：(a) 根据受害人群体的脆弱性情况确定哪些受害人群体应当首先和优先处理，其中脆弱性情况包括由受害导致的脆弱性，相关分析应包含社区造成的二次伤害；(b) 避免性别偏见，避免重蹈性别歧视的旧辙。东帝汶经验中的一些要素具有启发意义，显示了如何以注重性别平等的方式确定执行工作的优先顺序，其中顾及虐待受害人、身体或精神残疾人士、性暴力受害人、儿童、鳏寡人员、单身母亲。

四. 刑事起诉

49.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提高对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关注度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法院的规约将强奸视作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并认定了性奴役、强迫怀孕、强迫卖淫、强迫绝育等其他基于性别的犯罪。³⁹ 在取得此进展的同时，还产生了创新性的判例，对受害人和证人采用了程序保障，制定了注重性别平等的证据原则。⁴⁰

50. 这些进步使得在国内法院起诉性犯罪和性别犯罪的标准得到提高，积极引导了民事方的代表、检方和/或司法机构。

³⁸ Beth Goldblatt, "Evaluating the Gender Content of Reparations: Lessons from South Africa", in Ruth Rubio-Marin (ed.), *What Happened to the Women? Gender and Reparations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2006, p. 77.

³⁹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条和第八条。

⁴⁰ 例如，见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Akayesu*, ICTR-96-4-T, Trial Chamber, judgment of 2 September 1998;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Furundžija*, IT-95-17/1-T, judgment of 10 December 1998, and Kunarac et al, IT-96-23 and IT-96-23/1-A, Appeals Chamber, judgment of 12 June 2002.

51. 然而，性犯罪和性别犯罪有罪不罚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同时女性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在诉诸司法方面仍面临障碍，主要原因包括：司法官员态度疏忽、持有偏见；投诉程序中存在官僚化现象；调查和预审的完成不到位；证据评估中的解释不足，未提出刑事指控；立法不充分；满足受害人和证人需求方面存在缺陷；评估威胁情况方面存在缺陷。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妇女诉诸司法的第 33(2015)号一般性建议提供了这方面的具体标准。

A. 司法官员培训

52. 为了避免对性暴力以及基于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的犯罪见惯不怪，并防止重复对性别的歧视性观念和其他歧视性观念，有必要对调查队、检察官、法官以及行政、医疗和社会工作者进行培训。乌克兰国家法官学校制定了有关具体性别犯罪处理程序的培训课程。⁴¹

53. 有必要为司法官员提供足够的工具使其能够识别偏见，对其处理的案件进行综合的性别平等分析，包括就性犯罪和性别犯罪的调查和起诉执行特别规程，其中可参考特别国际法庭的最佳做法手册。

54. 在不同国家观察到了这一做法。例如，墨西哥国家最高法院就如何从性别平等视角进行审判制定了规程，总检察长办公室就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案件为国家司法机构人员制定了国家行动规程。在阿根廷，负责对在国家恐怖主义阶段侵犯人权案件调查工作进行协调和后续审查的检察官机构编写了题为“关于起诉在国家恐怖主义下所犯性虐待行为的几点考虑”的文件，⁴² 一个省法院还为向曾遭受被视为危害人类罪的性犯罪的受害人获取陈述制定了规程。

B. 适当评估工作实行专业化、获得优先处理

55. 加强国家起诉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犯罪的能力还包括推动专业化，并以此对此类案件给予优先处理。这方面良好做法的例子包括创建专门分庭或法庭，以及建立专门处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问题的检察官办公室和调查队。⁴³

56. 在调查和起诉中采用特殊的机构间模式，包括简化的程序、流动式设计、会说当地语言的法律工作人员(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流动法院)，使解决地理距离太远的问题成为可能。

57. 在哥伦比亚，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制的调查和起诉股有一个专门小组调查性暴力案件。哥伦比亚还设立了性别平等委员会⁴⁴ 并将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列入确定是否优先处理案件的标准。这促进了将女性性暴力受害者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认定为性别暴力受害者。

⁴¹ 来自乌克兰的回应。

⁴² 见 www.fiscales.gob.ar/wp-content/uploads/2012/11/Informe.pdf。来自阿根廷 Ombudperson's Office 的回应。

⁴³ 例如在克罗地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塞尔维亚、乌干达。

⁴⁴ 来自全球女性联合会的回应。

C. 保障措施和保护

58. 女性、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中性暴力或基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暴力的受害者能否有效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能否履行义务，在法院审理中确保受害者和所有其他参与者的安全和安保。

59. 一般的受害人和证人保护方案往往不能高效保护性暴力受害人，在提供保护时也往往做不到对性别平等因素保持敏感。必须对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受害人在调查阶段、法院审理期间、判决后可能面临的具体威胁情况进行适当的、性别敏感的评估，据以设计特别方案。

60. 也必须采用规章条款和具体措施来提供安全和私人的环境，同时要保护受害人的身份信息。

61. 所有这些措施都应伴有相关机制，使受害人和证人充分了解所面临的威胁和在进程所有阶段的保障措施。还应伴有后续检查机制，能在审判结束后找到受害人和证人。在所有司法程序期间，还应以社会心理学方式持续提供医疗援助。

五. 保证不再发生

62. 为履行预防职能，保证不再发生侵权行为，必须对侵犯行为的结构性和助长侵犯行为的因素进行注重性别因素的分析，从而设计出具有变革潜力的法律和体制改革措施。

A. 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改革和机构改革

63. 为保证不再发生侵权行为，必须对原已存在的性别不平等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之间关系进行分析，以期根除这些问题。

64. 应全面审查所有规章条款(宪法、民事、刑事或行政性质的以及传统监管系统中的规章条款)，目的是：确定并修正歧视女性、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规章条款；确保这些人正常行使其权利；探讨如何解决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问题。这方面应实施改革的例子包括：将同性恋非刑罪化的改革；将一切形式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包括婚内强奸和家庭暴力定为刑事犯罪；加强平等权利，包括下述方面的权利：性别认同和性别认同变化、婚姻(包括同性间婚姻)、离婚、生殖权利、堕胎、子女收养(包括同性配偶收养子女)、土地保有、继承。这些改革可有助于消除女性、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不受关注、缺乏法律保障、经济上依赖他人的情况。

65. 巴西国家真相委员会曾建议修正包含歧视同性恋内容的立法，结果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撤销了军政府时期实行的将同性恋定为刑事犯罪的《军事刑法典》第 235 条。⁴⁵ 阿根廷对《刑法典》进行了修订，规定当性犯罪受害人未满 18 岁或被宣

⁴⁵ 来自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过渡期正义研究中心的回应。

布不能自理时允许依职进行干预。⁴⁶ 厄瓜多尔真相委员会建议国家通过法律规章确立宪法规范,规定不得因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进行歧视,确保女性、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能参与“平等事务委员会”。⁴⁷ 哥伦比亚对规章条款作出一系列改进,旨在帮助克服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社会隔离状况。⁴⁸

66. 应特别注意改革司法和安全部门,对其进行清理,将任何曾实施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人免职,并对申请填补职位者进行制度化的背景调查。还应在执法机构中改善不同性别人员的占比状况(特别是就高级职位而言),如同科索沃、利比里亚、塞拉利昂所做的那样。必须以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方式对司法官员、警察、军官开展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此外,如同塞拉利昂所做的那样,通过在警察局、军队、检察官办公室、法庭内专门设立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股,提高了这些部门打击此类暴力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B. 教育

67. 一个与更广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进程互动不足的教育系统可能成为政治势头中的潜在因素,导致国家走上武装冲突的道路,破坏和平和/或助长暴力行为。有害的教育内容(传递定型观念、不准确的信息和对某些群体的负面描述)和教学法(威权式的或威胁式的学校环境助长或造成脆弱性问题,尤其是对女童和青年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而言)灌输不容忍行为,扩大性别差距和社会分歧。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南非的教育系统就曾是这样的例子。⁴⁹

68. 必须全面审查教育系统中现有的标准和政策,确定教育在助长或维持歧视和冲突方面曾扮演的角色,并改进教育系统,引领教育促进和平,将教育的基础建立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消除歧视的基础之上。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开展了这项工作。⁵⁰

69. 改革教育系统包括设计结构上的变革,通过普及优质教育克服过去不同程度的边缘化和排斥,在法律上和实际上保障人人(包括曾因实际或认定的族裔血统、宗教、文化、性取向、性别认同而受歧视者)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在这方面,利比里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曾建议采取措施向国内所有儿童普及免费的中学教育,同时重点解决现存的性别差距。⁵¹

⁴⁶ Contribution of Defensoría del Pueblo de la Nación Argentina。

⁴⁷ 来自厄瓜多尔的回答。

⁴⁸ 2011 年第 1482 号法(后经 2015 年第 1752 号法修订)、2015 年第 2340 号法令、2018 年第 410 号法令、2018 年第 762 号法令、来自哥伦比亚外交部长的回答。

⁴⁹ 见 Clara Ramírez-Barat and Roger Duthie, *Education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Peacebuilding*, New York, ICTJ, 2015。

⁵⁰ 见 Final Report of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Peru, “Actors in the conflict”, volume I, section 2, chapter 3 and “Recommendations”, volume IX, section 2, chapter 1, 2003。

⁵¹ Ramírez-Barat and Duthie, *Education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70. 此外，还必须考虑到学校环境(文化、管理)和教学方法，使改革具有全面性并实现其目标，推动善治和公民积极参与，抛弃学校当局专制、暴力和/或重蹈父权和男性主导这种旧辙的教育模式。肯尼亚和秘鲁的委员会在这方面提出了建议，利比里亚的委员会也建议采取措施为女童创造安全的学校环境，使其免遭人身虐待和性虐待。⁵²

六. 纪念

71. 纪念是过渡期正义的第五个支柱。纪念工作是对真相、正义、赔偿、不再发生机制的补充，在妥善应对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法行为所含的性别因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真相委员会工作的最终结果及其最后报告采用批判性方法、承认受害者的权利，从而以崭新方式解说最近的过去。这项工作不可省略的内容包括在正规教育内设置纪念课程，也包括纪念馆、文件中心、档库等其他机制。

72. 在教育方面，必须对学校教材和课程进行审查，确立共同记忆，在不同个人和群体之间重建健康平等的关系，建立对国家的信任。此类审查包含根据真相调查的结果以新方式阐述国家教材中关于以往暴力现象的内容，促进在其中纳入对所有受害人的承认，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通常被各种相互交错的偏见和定型观念所扭曲)。审查还会促进批判性思维，鼓励年轻人讨论某些做法的出现，为防止再次发生暴力行为而设计必要的改革。历史学科最可能包含真相委员会的工作和调查结果，也最可能涉及最近的过去，但小学和中学课程中的其他学科(例如文学、艺术、宗教或性教育课程，当然还有公民教育)也可从此类材料中获益。

73. 学校教材和课程使真相委员会的报告更容易普及到和传播给儿童、教师及其家庭。

74. 可以使用印刷品、视听媒介等方式设计各种直接反映记忆的教育工具和资源，例如文物、纪念活动、证词、报纸。⁵³ 教师也可建议开展创新、参与性、基于记忆的研究项目，还可建议参观纪念地、收集证词和口述历史等活动。这些活动能极大地促进对儿童和青年人进行关于历史遗留问题的教育、增强其创造性、促进代际对话、推动交叉对话。

75. 纪念活动以往采用静止形式(几乎都是英雄塑像和死者纪念碑，主角是男性和军人)，现已演变为更具活力的形式，包括建立实际纪念场所、开发象征性纪念场所、开展文化活动、进行文化表达等。促进这种演变的途径是与民间社会组织、文化行为体、艺术家、教育机构进行合作、开展互动。

76. 在南非，旧堡监狱这一昔日约翰内斯堡市的监狱现已改建成宪法山综合体，包括4个博物馆和宪法法院，是此种协同作用很好的例证。女子监狱是4座博物

⁵² 同上。

⁵³ Julia Paulson, "The educational recommendations of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s: potentials and practice in Sierra Leone",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4), 2006, pp. 335-350.

馆之一，展示了一般囚犯和政治囚犯遭受的基于性别的侵犯行为，还述说了著名女性反种族隔离活动家的故事。⁵⁴ 作为教育方案基地的另一个例子是意大利 Monte Sole 的和平学校这个曾被纳粹军队夷为平地的地区是纪念地。受影响社会的青年应邀到这里共同反思过去，重点关注性别问题、定型观念、偏见。⁵⁵ 柬埔寨政府协同一个非政府组织在马德望省一处寺庙综合体向公众开放了一座博物馆，以传播关于性别暴力的信息，同时在宗教部支持下于国内建设了多个纪念馆，以牢记性别暴力，并作为给未来人们的教训。⁵⁶

77. 纪念领域必须深化顾及性别平等的方式和关注，而不只局限于彰显女性的记忆或局限于思考女性传递记忆的方式。需要有意识地作出集中、交叉性的努力，从性别视角提出应分析的问题，包括向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群体提出这些问题，同时避免参照陈规定型观念和霸权观点。

七. 参与过渡期正义进程

78. 本部分重点关注个体或集体主体以协商形式参与进程。此处论述的问题涉及过渡期正义机制和进程的设计、内容、执行、评估。

A. 目标和益处

79. 秘书长认为“最为成功的过渡司法的经验表明，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进行了大量高质量的公众协商和被害人协商。”⁵⁷ 协商进程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助于增强过渡期正义机制的社会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也有助于恢复对国家机构的信心。⁵⁸

80. 如果协商进程中没有女性、女童和男童、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受害人的参与，则过渡期正义机制反映的关切事项、优先事项、利益、经历就可能存在偏差，并可能忽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有这些个体参与的协商进程应包含从设计到执行的整个过渡期正义进程。安理会在 2019 年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决议中明确鼓励国家确保曾遭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者有机会充分切实参与过渡期正义进程的所有阶段。⁵⁹

⁵⁴ 见 www.constitutionhill.org.za/pages/school-programmes and www.constitutionhill.org.za/pages/alignment-to-the-national-curriculum。

⁵⁵ 见 www.montesole.org/en/education/schools-and-youth-groups/。

⁵⁶ 来自柬埔寨的回应。

⁵⁷ 见 S/2004/616，第 16 段。

⁵⁸ 见 A/HRC/31/43，第 25 和 26 段，以及 A/71/567，第 5 和 6 段。

⁵⁹ 安全理事会第 2467(2019)号决议。

B. 减轻风险和挑战：敏感对待性别问题的协商进程的要素

81. 根据特别报告员任务授权发布的 2 份报告广泛探索了成功的过渡期正义机制协商进程的内在困难和一般规则。⁶⁰ 特别报告员探讨了这些规则，列出了其要素，以便从性别平等视角予以设计和执行。

1. 包容

82. 预先确定协商参与者时必须包容各方，克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性别偏见，从而避免损害协商进程的可信度。

83. 确定人员类别时应考虑到交叉标准，将下列各类人员包括在内：女性、儿童和青年；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土著社区成员；非洲人后裔；陷于贫困者和流离失所者；宗教、语言和族裔少数群体；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

84. 智利制定第一个国家人权计划时依据了与社会民间组织共同在各地举办的跨文化对话，其间鼓励与女性、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进行协商，也鼓励他们参与。⁶¹

85. 通过运用相关技术对团体和组织进行全面摸底，也通过采用抽样(如在布隆迪)、配额(如在波斯尼亚)、性别均衡等策略，有力地促进了参与机会的均等，推动了相关标准的执行。瑞士联邦司法与警政部建立了人员比例均等的圆桌会议，负责开展深入的纪念工作，并为强迫性措施受害人提供有关援助和家庭外安置的建议。⁶²

2. 安全和保护

86. 参与协商进程意味着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可能面临安全风险、社会风险、二次受害风险。为确定安全的协商地点，事先应对武装行为体活跃的地区和/或武装行为体控制的区域进行摸底。

87. 与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相关的刑事起诉、污名化、社会隔离的风险，不论是针对女性、男性、儿童还是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都是妨碍其积极参与协商进程的因素。安全条件必须得到保障，使他们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进行参与，由有资格与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受害人会面的同龄人在中立地点进行独立的协商。

88. 此外，保护措施也至关重要，尤其是要采取措施严格保障机密性、匿名性、数据加密、编码，甚至采取伪装式的保护措施。

⁶⁰ [A/HRC/34/62](#) 和 [A/71/567](#)。

⁶¹ 来自智利的回应。在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可以找到其他例子。

⁶² 来自瑞士联邦外交部的回应。

3. 可参与性

89. 有若干客观存在的实际障碍使参与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尤其是对女性和女童而言(如果她们属于土著、非洲人后裔、少数民族、农民、文盲、贫困者，则更加困难)。

90. 协商应当使用举办地的当地方言或当地语言，并应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组织，靠近确定的被边缘化的个人和群体的居住地点或转移地点。

4. 培训、沟通和提高认识，以及时限

91. 应通过预先培训使参与协商的女性、女童和男童、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受害人的能力得到提高，以确保他们了解进程的目的、原则、程序、实际范围。必要内容包括沟通战略、风险意识、透明度倡议、减轻风险措施、时限。⁶³ 信息流通必须连续不断，要采用合适手段将信息传达给参与者，其中要顾及地方、文化、宗教、族裔等方面的特点，并兼顾当地语言和方言。

八. 结论和建议

92. 国家在曾遭受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社会中采用促进性别平等的过渡期正义机制的义务来自国际人权法的主要和次要法源，因此政府不得使用政治、结构或预算的借口逃避责任。

93. 性别平等视角要求在考虑到交叉性这一标准的情况下，每一个设计和执行的过渡期正义措施有意识地、适当地承认和呈现女性、男性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复杂经历。否则真相调查、正义、全面赔偿、保证不再发生和纪念的进程是不完整的。

94. 特别报告员为政府执行促进性别平等的过渡期正义机制分享如下建议。

真相委员会

95. 确保真相调查工作中明确提及审查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原因和结果，以及以性别平等视角全面开展工作；同时，专员的遴选和任命是性别平衡的，并包括了相关社区和群体的参与。

96. 建立可以实现主流化和专业化的复合型组织结构，对委员会工作人员进行持续培训以确保其提高认识、克服偏见，特别注意培训负责收集证词、分析、调查的小组。

97. 确保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分类法包括：性别方面的行为；采用宽泛的定义，而限于人身损害；描述侵犯行为的不同影响；记录直接侵犯行为和间接侵犯行为，记录这些行为对直接受害人和间接受害人的影响。

⁶³ Cristián Correa, Julie Guillerot and Lisa Magarrell, “Reparations and victim participation: a look at the truth commission experience”, in Carla Ferstman, Mariana Goetz and Alan Stephens (eds.), *Reparations for Victims of Genocide,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Brill, 2009.

98. 就女性、性别、同性恋或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群体等专题举行听证会，其程序和场所应当是安全而有尊严的，要让参与者知情，并应避免二次伤害。

99. 采用积极主动的传播与宣传战略激励女性、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以及一般性暴力受害人提供陈述；鼓励与专门的民间团体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强化性别平等视角，同时与倡导这一进程的社会行为体建立联盟。

100. 确保最后报告从性别视角论述过往暴力行为的原因、结果、背景，其依据应是在内部分发和跨机构传播的性别调查结果和研究小组发现及其得到的反馈。

赔偿

101. 确保赔偿方案融入性别平等视角，确定对不同性别、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起到不同作用的措施。

102. 确保有资格获得赔偿的侵权行为清单和受害人类别做到：不重蹈性别歧视的旧辙；包含受害人和主要曾受害人的亲属，对家庭的定义不局限于死板的或纯法律的概念，也不局限于主流文化观念。

103. 确保赔偿措施顾及下述因素：性别及其交叉性质；所遭受损害的复杂性，其对女性、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日常生活的影响；犯罪行为 and 赔偿可能造成的污名化后果；一些措施对性别排斥格局的潜在变革性影响。

104. 就针对具体性别的相关侵权行为采用推定办法，或者采用较低的或不同的证据检验办法，规定由评定机构承担证明责任，或规定有权要求确定某些侵权行为是否属于累犯情况，从而建立有推定规则和积极区别对待规则的适当制度。

105. 确保赔偿方案做到：具有创造性和灵活性，以克服社会文化方面和行政方面的障碍；考虑到女性、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法律上和实际上的财产所有权和身份权，并考虑到抵偿措施和道歉措施；确保赔偿方案是受害人易于理解和便于诉诸的。

起诉

106. 推动司法官员、行政工作者、医疗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以克服疏忽和有偏见的态度；为性犯罪和性别犯罪调查和刑事起诉制定特殊规程，就执法、司法、法医领域以敏感对待性别问题的方式提供医疗服务制定规程。

107. 评估是否应创建专门分庭或法庭，以及是否应创建专门处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问题的检察官办公室和调查队；在调查和起诉中采用特殊的机构间模式，包括简化的程序、流动式设计、会说当地语言的法律工作人员，以便利受害人诉诸相关机制。

108. 采用确保安全、酌处权、保密性的受害人和证人保护方案，对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受害人在调查阶段、诉讼阶段、定罪后阶段面临的具体风险情况以注重性别因素的方式进行评估。

保证不再发生

109. 对所有法律条款进行全面审查，以确定哪些条款歧视女性、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哪些条款对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及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行为关注不足，并加以修改。

110. 改革司法部门、安全部门、武装部队，酌情采纳公平透明的资格审查方法；改善不同性别人员的占比状况(特别是就高级职位而言)；制定采用性别平等视角和关于性别平等视角的培训方案；建立专门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股。

111. 审查所有教育阶段的教材和课程，纳入真相调查工作所提供的对暴力历史的重要描述，抛弃专制、暴力和/或重蹈父权和男性主导这种旧辙的教育模式；对按照族裔、宗教、文化、性别、实际或认定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将人边缘化、对人加以歧视的教育系统进行改造。

纪念

112. 确保对独霸式父权文化中过往在纪念暴力事件方面所采用的方法进行批判性分析，确保在设计此类活动时对女性、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群体的权力采取性别平等视角，并包容交叉性。

113. 纪念政策应避免使人对历史记忆保持陈规定型的观念。

参与

114. 与女性、女童和男童、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和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受害人共同协商如何制定过渡期正义政策，包括以下方面：机制的设计和执行，真相委员会及其他相关主体成员的构成和遴选，建议(尤其是与赔偿相关的建议)的拟定和执行。

115. 在确定参与协商的人员或行为体的类别时，应考虑到交叉式性别标准。

116. 确保协商进程做到：在参与者安全而有保障的条件下进行，使参与者能诉诸在语言、地点、补偿方面为其提供的措施，就协商的主题、实际程序、范围制定培训、沟通、提高认识战略。